

早期信仰与选择认同：巴蜀图符再考察

王天佑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关键词：巴蜀图符，二元村墓地，信仰，认同

摘要：从二元村墓地所见巴蜀图形和符号来看，巴蜀图符与蜀人早期信仰有关，可能是蜀人古老信仰图形化和符号化表达。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和战国中晚期是巴蜀图符发生明显变化的两个时期。巴蜀图符处在一个不断丰富、调整和变化的过程中，战国中期以后，其表达古老信仰的含义弱化，更多强调一种身份认同或族群认同，也存在着认同变化。释读巴蜀图符要放在动态的社会情境中去考察，一种图符可能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涵义表述，相同的涵义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群体中可能又会呈现出不同的图形和符号。

KEYWORDS: Ba-Shu paleographic symbols, Shuangyuancun cemetery, Belief, Identity

ABSTRACT: The graphic symbols unearthed from the Shuangyuancun cemetery indicate that the paleographic signs of the Ba-Shu region were closely intertwined with the early beliefs of the ancient Shu people. These symbols likely served as visual and symbolic expressions of spiritual traditions in early Shu society. Two major phases of transformation in the Ba-Shu symbolic system can be identified: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lat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o the early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from the mid to 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Over time, these symbols underwent ongoing refinement, reinterpret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mid-Warring States period onward, their role as expressions of spiritual belief gradually waned, while their function as markers of group identity and affiliation beca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reflecting broader patterns of identity negotiation. Consequently, the interpretation of Ba-Shu symbols must be contextualized within their specific social and historical settings. A single symbol may convey different meanings across periods, and a consistent idea may be represented by diverse symbolic forms, varying with time and community.

一、引言及称名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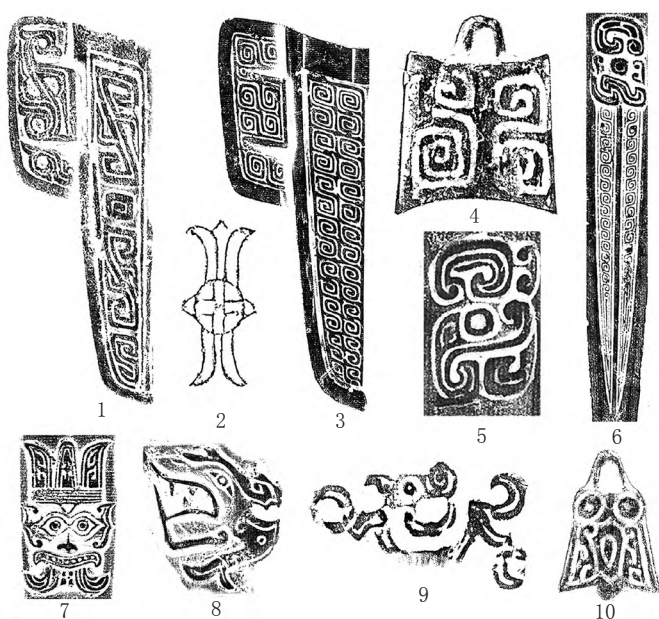
巴蜀青铜兵器经常装饰一些图形和符号，内容主要有两类，一是可辨识的象形物像如动物、人物、器物等，一类是含义不明无法辨识的抽象符号。这两类形象经常组合出现，与装饰性的纹饰区别明显，又不同于文字。自发现以来，就引起学界持续关注，对其性质先后有文字说^[1]、图语说^[2]、巫术符号说^[3]、族徽说^[4]等等。无论哪一种说法，似乎都有一定道理，但都无法完整地概括其性质，故多数学者经常使用“巴蜀符号”这一比较中性的名称。

《巴蜀符号集成》（以下简称《集成》）全面收集了迄今公开刊布的巴蜀符号器物总数量835件，另附录53件，整理、收录符号272种，时代从战国初期至西汉早期。书中将272种符号依其形象分为人形、植物形、动物形、器物形、建筑形、几何形六大类^[5]。江章华《巴蜀符号的变迁及性质分析》（以下简称《分析》）将巴蜀符号分为具象纹类、半抽象符类、抽象符类三种，并认为不同类的巴蜀符号在青铜兵器、青铜工具、印章等不同载体上的性质、功能有所区别^[6]。《集成》和《分析》是该领域研究的最新成果。《集成》中巴蜀符

号的分类，侧重于含义不明无法识别的符号，象形物像仅包括一些小型化且与符号组合出现的人形、动物形等，一些形体较大居于主体地位和单独出现的象形物像（如浮雕蝉、虎、鸟）并未归入巴蜀符号。《分析》一文认为具象纹类与抽象符类的含义可能不同，但在其分类中明显包含了各类象形物像。

抽象符号和象形物像在不同器用上的构图地位和使用频率不一，已有多位学者指出两者可能有别。如孙华认为这种蝉、虎等单独出现的图形是属于从“巴蜀符号”中蜕化出来的，正失去“巴蜀符号”特有的意义而变为纹饰的图形^[7]。刘豫川认为符号、纹饰是有界限的，但纳入印章的所有符号都不是纹饰^[8]。代丽鹃将在兵器上居于主体地位，浅浮雕式且形象复杂又单个使用的动物形象归为动物纹，将较小的、抽象的、组合使用的多见于印章、工具上的归为符号，同时指出二者之间有关联，界限并不十分明晰^[9]。由此可见，形体较大居于主体地位或单独出现的象形物像与小型且组合出现的象形物像性质是否一致，前者是一种装饰性纹饰，还是具备一定含义的图形以及能否归入巴蜀符号范畴等等，是释读巴蜀符号的前提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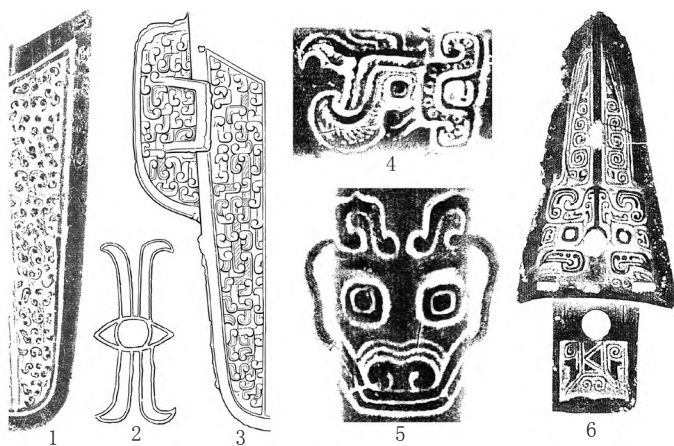
象形物像和抽象符号形态差别很大，含义可能有别，分类上应该区别对待，但两者经常组合出现，联系紧密，从性质上又似乎难以完全割裂开来。鉴于符号一词具有倾向性，易指向抽象符号，我们认为使用巴蜀图符这一称名比较恰当。在厘清巴蜀图符范畴之前，这个称名所包含的内容应该尽可能的广泛，即包括这一时期所有本土器物上出现的图符和非本土器物上的抽象符号。分类上可以将所有能够辨识含义的象形物像或纹饰统一归为甲类图形，将含义不明无法辨识的抽象图符归为乙类符号。过去由于出现巴蜀图符的器物



图一 双元村第一阶段所见甲类图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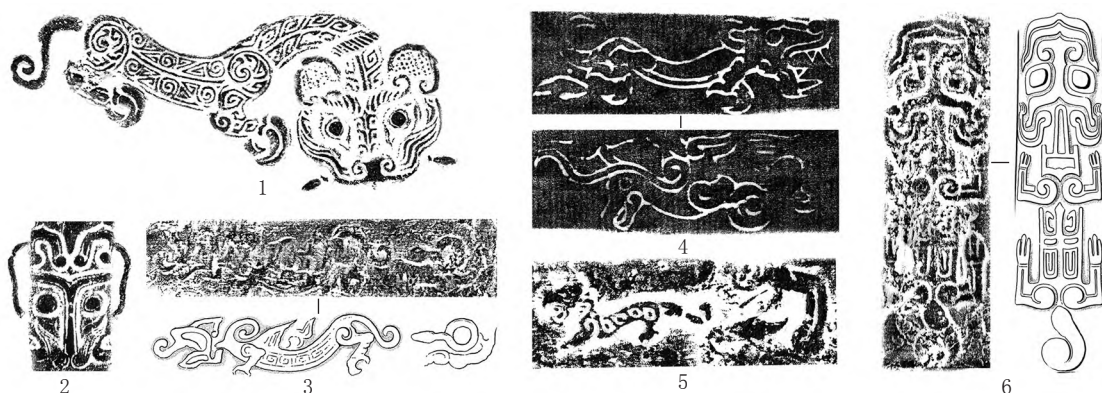
- 1、3、4. 云雷纹 (M215:5剑鞘、M265:3剑鞘、M276:1铜铃)
2. 变形蝉纹 (M10:4剑) 5、6. 兽面纹 (M152:1剑、M273:3剑)
7. 神面纹 (M200:4剑) 8. 浮雕虎首纹 (M200:1戈) 9. 透雕飞鸟纹 (M56:2-3削刀) 10. 浮雕蝉纹 (M276:2铜铃)

年代多在战国时期，所以许多研究者将巴蜀符号出现时间从战国早期算起，以此为基础进行组合、分类以及性质、族属的研究。但东周巴蜀兵器上最早出现的图形是什么？甲、乙类图符究竟是同时出现或者是某一类先出现？二者组合又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生？在什么情境下发生？哪些发生了组合？那些没有发生组合？前后发展变化如何？囿于资料，许多研究对这些



图二 双元村第二阶段所见甲类图形

- 1、3. 蟬纹 (M11:31剑鞘、M270:3剑鞘) 2. 变形蝉纹 (M185:2剑)
4~6. 兽面纹 (M7:12矛、M180:3矛、M46:14戈)



图三 双元村第二阶段所见虎图形

1. 浮雕顾首虎纹 (M46:19戈) 2. 虎首纹 (M46:6矛) 3. 侧行奔虎+蛇纹 (M11:39矛) 4. 虎、心+鸟、手型 (M158:1剑两面)
5. 侧行虎纹+手、心形 (M173:3矛) 6. 匍匐虎纹 (M11:40矛)

问题往往无法深入展开讨论。双元村墓地共清理274座东周墓葬，出土各类青铜器701件^[10]，年代跨度从西周晚期至战国中晚期^[11]，为深入探讨这些问题提供了契机。

二、双元村墓地所见图形、符号分段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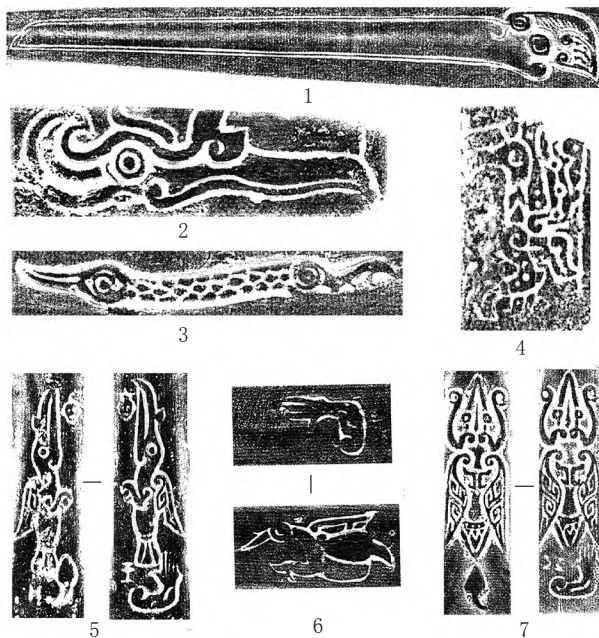
从甲、乙类图符的发展变化来看，双元村

墓地所见图形和符号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即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此阶段共计22件（套）器物上装饰图形。包括铃4、鞘及剑6、削刀1、剑9、矛1、戈1等。图形包括云雷纹（图一，1、3、4）、变形蝉纹（图一，2）、兽面（图一，5、6）、神面（图一，7）、浮雕虎首（图一，8）、镂空透雕鸟纹（图一，9）、浮雕蝉纹（图一，10）等。

第二阶段即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此阶段55件（套）器物上装饰图形和符号，包括鞘及剑8、剑13、矛12、戈5、削刀3、钺1、圆牌饰1、铜印1、骨印10、石印1等。

本期属于甲类图形的有云雷纹、蟠螭纹（图二，1、3）、变形蝉纹（图二，2）、兽面形、蟠龙形、虎、蝉、鸟、蛇、鹿、鱼、人面形、壘、钟、树形等。其中云雷纹或蟠螭纹仅装饰于剑鞘上。变形蝉纹仅装饰在剑上（包括剑鞘内所插之剑）。神兽形有兽面、饕餮、夔龙等（图二，4~6），出现五次。虎有虎首、匍匐虎、顾首虎、双翼侧奔虎和吐舌侧行奔虎等多种形态（图三），共出现12次等。鸟有长喙鸟、翘尾立鸟、展翅飞鸟、长羽变形鸟、鱼鸟形等多种形态（图四，1~6），共出现九次等。蝉为浅浮雕式，形态相似，出现二次（图四，7）。另外还有蛇形（图三，3）、鹿形（图五，1）、人面形（图四，3；图五，8）和树形（图五，3）等，各出现一次。10件骨质印



图四 双元村第二阶段所见鸟、蝉纹

1. 长羽变形鸟纹 (M11:30剑) 2. 长喙鸟纹 (M185:6矛) 3. 鱼鸟纹 (M74:8剑) 4. 翘尾立鸟纹 (M11:31鞘底) 5. 展翅长喙鸟纹+人面形、手、心、王形 (M136:2矛两面) 6. 展翅飞鸟纹+手形 (M139:5剑两面) 7. 蝉纹+手、心、亚腰形 (M11:46矛两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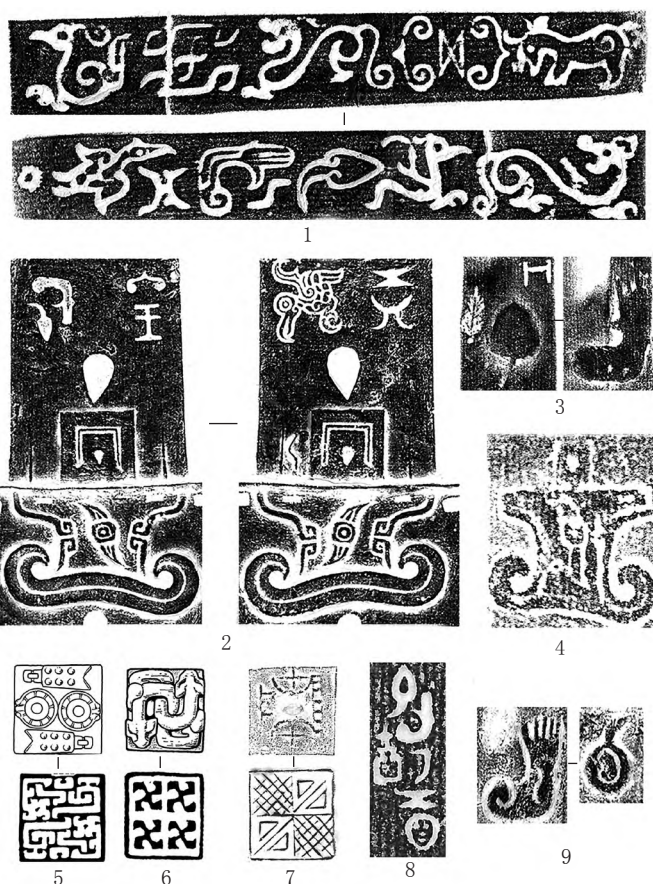
章的印钮为浮雕壘、钟、蟠龙形，印面多为顾首虎纹和花形等（图五，5、6）。

乙类符号有手形、心形、亚腰形、云头形、王形、底座形、立杆形、“工”字形、反向括弧形、勾折形、曲尺形、对弓形、类钟形、花形、星角形、圆圈形、三角形、方格形、方格台形等（图五，1~4、7~9）。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手形和心形，二者作为一种较为固定的组合共出现十二次，其次是亚腰形，出现八次，其余符号多出现一到二次。

第三阶段即战国中、晚期。此阶段共计90件器物上装饰图符，包括青铜剑12、矛59、戈6、钺4、斤3、削刀2、釜1以及锡印3等。

本阶段甲类图形中的蟠螭纹基本消失，云雷纹主要饰于矛的骹口一周。浮雕兽面图形基本消失。其余的蝉、虎、鸟、蛇、鹿、人形、神面形、壘、钟形仍旧流行。蝉出现十次。单独浮雕的虎、匍匐虎减少，多为侧行奔虎等（图六，7、8），出现三十一处。鸟形象中第二阶段单独出现的鱼鸟形、长羽变形鸟等基本消失，以长喙鸟和翘尾立鸟为主（图七，1、7、8），出现十一次。鹿、蛇、龟等形象单一，均与抽象符号组合出现。鹿出现三次，蛇出现一次，龟形出现二次。人形有人面、神面、跪人、立人等形象，人面形一次、跪人四次、立人一次、神面三次，均装饰在矛上，与抽象符号组合出现。壘、钟均以刻画符号形像出现，其中壘形出现六次，钟形（类钟形）出现二次。本期在矛上还新出现了一些甲类图符，包括虎头、蛇头分饰于骹部两面，身体对向弯曲、口中吞噬物体的动物形象2件（图六，3），螳螂形象3件（图六，5、8），甲壳虫形象1件等（图七，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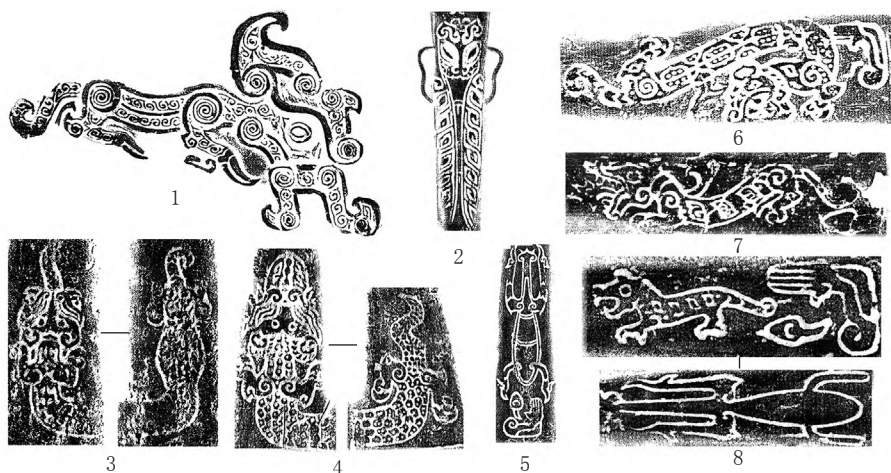
本期乙类符号除第二期个别出现在印章上的方格台形、方格形、三角形等符号并未出现外，其余在第二期出现的符号均多次出现。



图五 双元村第二阶段所见乙类符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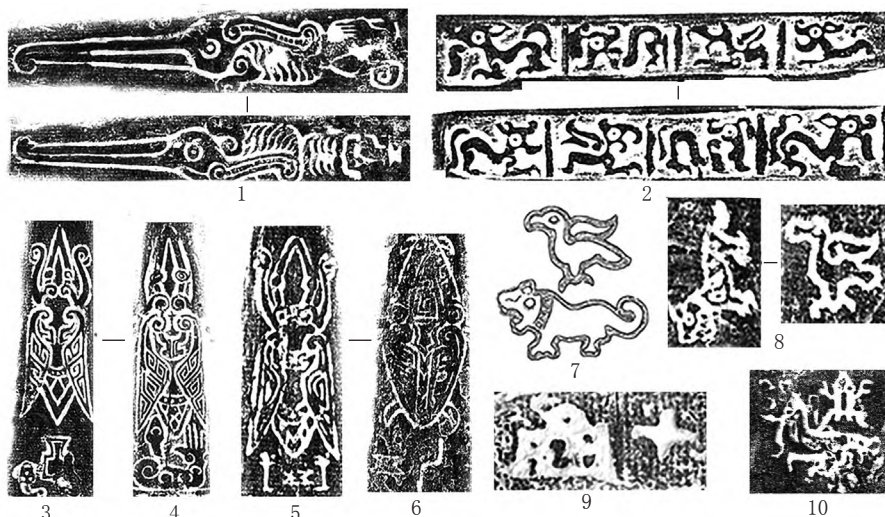
1. 虎、鸟、鹿形+手、心、亚腰、曲尺形、云头形、反向括弧形等（M46:25削刀柄部两面）
2. 底座形+手、心、王、云头形、鸟、亚腰形、几案形等（M180:17戈两面）
3. 树形+手、心、“工”字形（M161:4剑两面）
4. 底座形（M23:4剑）
5. 壘、钟钮+虎形印文（M154:53骨印）
6. 蟠龙钮+花形印文（M154:78骨印）
7. 方格台形、伞形+几何形印文（M154:55铜印）
8. 人面、亚腰、勾折、类钟、星角形、手、心形组合（M152:52铜圆牌饰）
9. 手、心形（M23:6剑两面）

另外本期还新出现了腰鼓形、双草栏形、水草形、波形、旗杆形、并蒂形、直三叉形、削刀形、双钉形、网格建筑形、方格门形、云头形、十字形、月牙形、太阳形等符号（图八）。出现频次最高的仍旧是手形和心形，二者组合出现三十一处。其次是亚腰形、勾折形、曲尺形、星角形、云头形等，其中勾折形和曲尺形多两两相对呈固定组合出现。新出现符号中频次较高的有水草形九次，直三叉形八次，双草栏形八次，旗杆形六次，腰鼓形五次等，其余符号仅出现一到二次等。除手、心形符号，大部分抽象符号不单独出现，均与其它符号组合出现。



图六 双元村第三阶段所见虎、螳螂纹与乙类符号组合

1. 浮雕侧视虎纹 (M84:12戈) 2. 虎首纹 (M19:22矛) 3. 虎、蛇吞噬纹 (M19:23矛两面)
4. 虎首+虎尾纹 (M107:3矛两面) 5. 螳螂纹+手、心形 (M68:4矛) 6. 顾首虎纹+手、心形
(M88:30矛) 7. 侧行翼虎纹+心形等 (M35:7矛) 8. 虎、螳螂纹+手、心形 (M35:4矛两面)



图七 双元村第三阶段所见鸟、蝉与乙类符号组合

1. 长喙鸟纹+手、心、亚腰、波形等 (M35:3矛两面) 2. 虎、鸟形 (M84:8削刀柄两面) 3. 蝉+人面、类钟形 (M84:1矛) 4. 蝉+手、心形 (M21:3矛) 5. 蝉+王、亚腰形 (M30:4矛) 6. 甲壳虫形+亚腰、曲尺形 (M105:5矛) 7. 鸟、虎形 (M99:15钺) 8. 鸟、虎形 (M99:6斤两面)
9. 鸟+星角形 (M99:7) 10. 虎、龟形 (M88:1钺)

从甲、乙类图符的发展变化来看，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仅流行甲类图形，数量较少。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开始出现乙类符号，但仍以单个使用的甲类图形为主。饰有乙类符号的器物23件，甲、乙类组合出现的器物有13件。战国中、晚期以乙类符号为主，饰有乙类符号的器物65件，甲、乙类图符组合出现的器物有39件。从发展变化来看，甲、乙类图符都是处在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中。从形态

上看，甲类图形经历了从具象、形体较大、形态多样到抽象、小型化、符号化、单一化发展的过程，乙类符号经历了从单独、松散组合向多样、固定组合发展的过程。

最早出现的甲类图形中，云雷纹、蟠螭纹、兽面纹、变形蝉纹等数量逐渐减少，并未流行起来。其中云雷纹、蟠螭纹以及夔龙、饕餮等兽面纹显然是将中原青铜器上的纹饰转化到巴蜀铜器之上，这些纹饰到东周时期，其装饰性效果已经大于实际意义。虽然许多报告将变形蝉纹其称作蝉纹，作为一种称名是可行的，但是否蝉则值得商榷。这种图形仅饰于一种扁平无脊的柳叶形剑上，战国中期以后基本不再流行。这几种图形均未与乙类符号发生组合关系，故不纳入巴蜀图符考察的范畴。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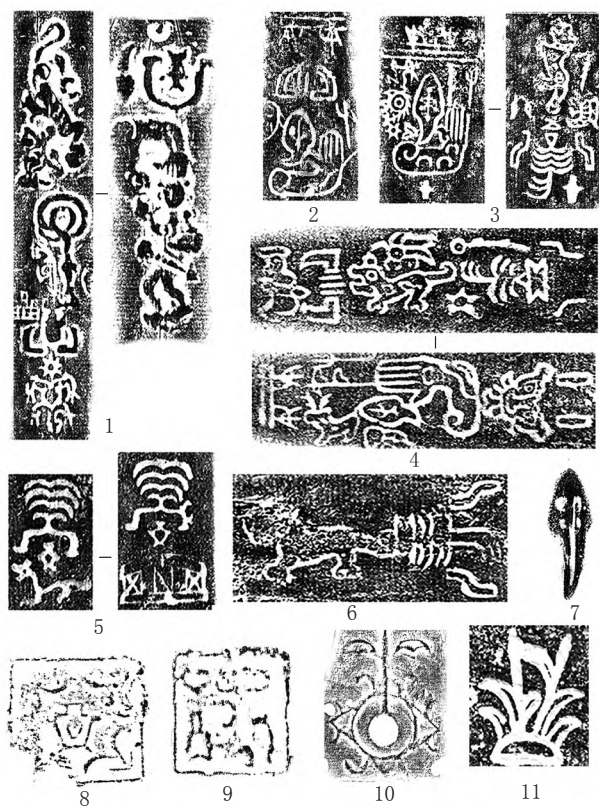
余与乙类符号发生组合关系的甲类图形均应纳入巴蜀图符统一考察的范畴。

三、巴蜀图符产生的社会情境及性质分析

与乙类符号发生组合关系的甲类图形中，神面、虎、蝉、鸟等出现时间较早，最先单独装饰在器物上。其余的蛇、鹿、鱼、龟、壘、钟、人形、树形、花卉等基本上伴随着乙类符号组合出

现。这些物像在三星堆、金沙遗址中均有大量出现，多与早期蜀人的祭祀信仰有关。如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铜神树每个枝头都立有铜鸟，金杖上镌刻鸟纹、鱼纹及神面纹等，还有虎形金箔、铜蛇，琥珀坠饰上阴刻的蝉纹等^[12]。金沙祭祀区出土金冠带镌刻有鱼纹、鸟纹等，还有圆雕石虎、石人、石蛇，石龟以及铜鸟构件、铜罍、罍残件，玉璋上刻画的蝉纹等等^[13]。乙类抽象符号在第二阶段即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出现并流行起来。《华阳国志·蜀志》载这一时期开明蜀王之“卢帝攻秦，至雍。生保子帝。帝攻青衣，雄张僚熒”^[14]，说明其统治范围北部至少已达汉中以北，南部已达川南长江附近。此时，强盛的开明王朝统治者进行了一系列礼仪性的社会变革，如果说“以酒曰醴，乐曰荆”等变革是对楚文化、楚制的模仿推崇，是一种“革新”，那么“始立宗庙”“帝称王”等就暗含着对本土文化的坚守与自信，大量本土仿古礼器的出现，应该是上层社会一种有意识的“复古”^[15]。在此复古背景下产生的乙类符号，一经出现便选择性与古蜀人祭祀信仰有关的物像发生了紧密的组合，表明乙类符号可能也与蜀人古老的信仰有关。

俞伟超指出，以血缘联系为基础的氏族社会，人类的文化传统相对单纯。但当以地缘纽带为基础后，社会成员的来源会复杂起来，文化的组成因素也会逐渐复杂化。特别是社会成员的地缘联系进入到远为广阔的范围，从而必定促使文化的结构发生相应变化，但此时原先那种血缘关系紧密的、世系悠久的贵族集团，自然希望保存从前的文化传统^[16]。此时，社会精英阶层必须通过某些“集体记忆”或“共同的起源”来维系群体的凝聚，也需要不断的重新调整甚至假借、创造新的“过去”，以适应现实变迁^[17]。以图形、符号来表达古老信仰似乎成了维系族群凝聚力、适应现实社会的有效手段之一。既有的考古资料表明，巴蜀图符难以区分出巴人或蜀人的专用符号，但在一些墓地、区域、四川盆地的东部与西部，确有一些



图八 双元村第三阶段所见甲、乙类图符组合

1. 立人、手、云头、罍、心、半括弧形+虎、蛇、网格、圆心星角、龟形等 (M35:9矛两面)
2. 手、心形、直三叉、对勾折、双草栏形等 (M28:8矛)
3. 腰鼓、手、心、星角、鹿、旗杆、直三叉、双草栏形+腰鼓、水草、对曲尺、并蒂、变形鸟、虎形等 (M19:2剑两面)
4. 神面、手、心、星角、旗杆、直三叉、鹿、双草栏形+对曲尺、水草形、削刀形、星角、虎、变形鸟、勾折、跪人形 (M62:3矛两面)
5. 波形、云头、罍、虎+波形、云头、罍、方格建筑形 (M35:11斤两面)
6. 虎、水草形、对曲尺形 (M162:1)
7. 心形 (M29:1剑)
8. 罍形印文 (M104:1-1锡印)
9. 钟形印文 (M104:1-2锡印)
10. 月牙形、太阳形 (M104:14戈)
11. 草垛形 (M82:6钺)

符号相对集中或某一类符号只见于某一地，施劲松认为这符合族徽性质^[18]。王仁湘称为“禁约”现象^[19]，反映着不同部族固有的历史传统与文化心理，表现出他们独特的信仰。但这些“禁约”符号多出现在战国中晚期，数量占少数，大部分图符通行于巴蜀区域。总之，巴蜀图符不排除聚落性（地域性）特征，似乎也不完全具备族徽、族属的特征。双元村墓地所见图符发展变化表明，巴蜀图符应该与蜀人的早期信仰有关，可能是蜀人古老信仰的图形化和符号化表达，处在社会变革、人群变迁的复杂

社会情境中，其内容、形式也处在一个不断调整和变化的过程中，战国中期以后，其表达古老信仰的含义逐渐弱化，可能更多的强调一种身份认同或族群认同，也可能存在着认同变化。

四、巴蜀图符表现方式和补刻现象分析

双元村青铜器上出现了最早虎、鸟、蝉等巴蜀图符，以此为线索，通过一些能够辨识的图形前后发展演变及组合关系，尝试对部分图符释读，以期掌握巴蜀图符构图上一些规律性和习惯性表现方式。

（一）不同时期人、虎关系的表现方式

双元村M200:4铜剑靠近茎部两面浅浮雕一神面^[20]，首带山形高冠，长獠牙外撇，不同于人，也与兽有别，可称之为神人（图一，7；图九，1）。M200:1铜戈援本部浮雕侧视虎头（图一，8；图九，2）。该墓时代在春秋中期，是目前巴蜀兵器上见到最早的虎图形。神人与虎共出一墓，表现出二者紧密的关系。虎是力量和威严的象征，古人既敬畏、崇拜虎，又试图驱虎、驭虎，面目狰狞的神人被赋予了这种超自然的能力。成都白马寺出土1件铜

戈^[21]，具体年代不详，带山形冠的神人坐在虎背，虎口还吞噬物体，这是神人驭虎的直观表现（图九，3）。牟托M1:124铸钟^[22]一面刻画一侧行奔虎，背上一“山”形符号，应该是山形冠的含义，用以指代神人，是同样的概念表达（图九，4）。《集成》收录山形符号8件，除牟托M1:124钟，还有1矛、3剑、3印章等，其中收录的成都簸箕街出土铜剑山形符号模糊不清，罗家坝M40:2铜剑山形符号与手形、人形组合，成都三洞桥铜矛以及涪田小区征集的铜剑均和虎纹组合，可能都有山形冠的含义。3枚印章上图案模糊，山形符号笔画很不规范，是否有山形冠的含义，尚无法确定。罗家坝M33出土3件铜戈（M33:98、102、106）^[23]，援本浮雕正视虎首，虎耳上方饰两只巨手，也是表达神人驭虎的主题（图九，5）。牟托M1和罗家坝M33的年代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前者在川西高原，后者在川东地区，都不在传统的蜀人区，可能族属不同，但表达了一个共同的主题。虎在现实世界有原型，形象逼真，而神人则是为了现实需要而创造出来的虚拟形象，受构图空间制约或族群记忆的模糊不同族群选择用不同的局部来抽象表达，或是山形冠，或是

巨手，或是獠牙。双元村M28:3铜矛骹部饰一侧行奔虎，虎尾上部饰一反向括弧形符号（图九，9），这种符号可能是神面獠牙的抽象表现，该墓年代在战国中期晚段。这种虎吐长舌，带项圈，背有双翼，被赋予了更多的神性。《集成》分类中有一种半括弧形，弯曲的两端很尖，形似獠牙，其中收录的犍为金井乡万年村M6:2铜矛、金井乡五联村M1:1铜剑、罗家坝M44:52铜剑、小田溪M1:20和M12:105铜剑以及分类到另一种深半括弧形符号的成都市光荣小区M5:2铜矛、什邡城关M38:3铜矛、城关M16:7铜剑等，均与侧行奔虎组合，布局与双元村



图九 不同时期人、虎关系的表现方式

- 1、2. 神人+虎（双元M200:4剑、M200:1戈） 3. 白马寺戈 4. 牟托M1:124钟
5. 罗家坝M33:98戈 6. 城关M38:17矛 7. 符溪铜戈 8. 罗家坝M44:52剑
9. 双元M28:3矛 10. 双元M88:30矛 11. 红光公社戈 12. 双元M82:11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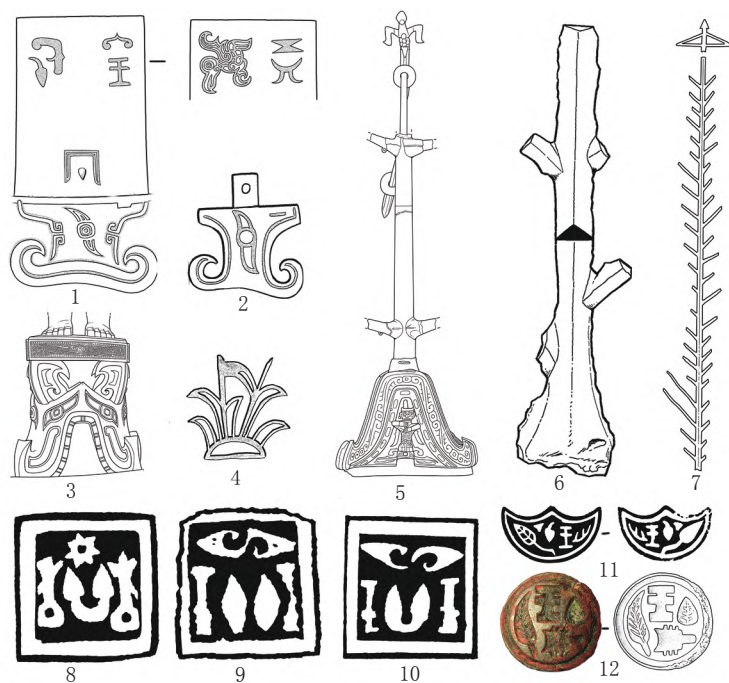
M28:3接近，这种半括弧形可能也是神人獠牙的简化表达方式。罗家坝M44:52铜剑翼虎背上除半括号形，还有一种钟形符号^[24]（图九，8），这与牟托M1铸钟上刻画虎纹似乎有异曲同工之效。

双元村M62:3和M82:11^[25]（图九，12）铜矛是装饰图符数量最多的两件器物，前者有17种（图八，4），后者有15种（图九，12）。二者都有神面和虎图形，两墓年代接近，在战国中期或稍晚阶段。M82神面和虎在骹部同一面，M62神面和虎分饰骹部两面。神面没有了山形冠，类似面具，但有长獠牙，许多报告将其解读为虎首，如果是虎首，就与侧行奔虎重复出现，所以还是神人和虎的一种表现方式，只不过神面和虎首很相似，很多时候不易区分。《集成》归入神面类的城关M38:17铜矛上应该是虎首，虎首上一常见手形^[26]符号，应该是神人驭虎概念的表达（图九，6）。除虎和神面外，还有鹿、跪人以及手、心形、旗杆形、直三叉形、双草栏形、水草形、亚腰形、对曲尺形等符号。双元村第三阶段出现的图符组合，大部分是这种几种图符的变化组合，可能具有相同的概念表达，只不过有些繁复，有些简化。严志斌和洪梅对水草形做过统计分析，认为水草形与其它符号的组合是逐渐累加的过程，战国晚期早段最为繁复，不具备族属性和族群性，应该是概念表述的繁化和细化^[27]。其中跪人及右侧的对勾折形，构成一种常见的固定图符。《集成》根据对勾折形与跪人的位置不同分了两类，对勾折形在跪人右侧的25件，在上方的1件。除荣经南罗坝村M1:50铜矛模糊未见虎纹，其余25件都与虎或神面组合，其中19件跪人位于虎的前方，虎形较小，为侧行奔虎，构图方式与双元村M62和M82相近。而收录的重庆地区余家坝墓地4件铜戈以及郫县红光公社、峨眉符溪出土的2件铜戈上的虎均为浮雕的张大嘴翼耳虎或侧行虎，这种构图方式把虎表现的凶猛逼真，造型很大，而把跪人以很小的符号表现出来，跪人的位置也不尽相同。红光公社铜戈虎为翼耳虎^[28]（图九，11），跪

人在虎首左侧，对勾折形位于跪人右侧，跪人腰间插物，与勾折形连为一体，这个跪人形象与双元村M62、M82铜矛上的相似。而峨眉符溪铜戈上虎口大张^[29]（图九，7），跪人被捆绑，对勾折形位于跪人下方，跪人置于虎口下方，这种形象就很直观，表现的是虎食人。2件跪人姿态不同，发型也不同，可能表示其身份、族属不同。跪人、勾折形图符是战国中期以后出现的新内容，双元村M62和M82神人及虎、跪人等表现的可能是一种祭祀场景，与之组合的其它符号可能也与祭祀活动有关。与跪人组合的对勾折形可能是献祭的一种工具，也可能是一种刑具。这种勾折形与其它图符也有组合出现，也单独出现，其表达祭祀工具的含义可能要多一点，但不排除某些时候充当刑具的可能。严志斌和洪梅在分析钟形符号时认为荣经南罗坝M5:22骨印钟、壘下面饰一道横线，可能是承放钟、壘的禁或几案的象形表达，同时指出马家木梓墓铜印上壘两边人形抬一杠的图案可能是禁或几案的细致描绘^[30]。以抽象符号表示某种祭祀工具可能是巴蜀图符常见的方法之一。

（二）底座、神树以及手形、心形、王形图符的解读

双元村M180:17铜戈援本两面由浮雕的勾曲纹组成一个封闭的亚腰形图案^[31]（图五，2；图一〇，1），中间为纵目形。双元村M23:5铜剑和M171:4号铜戈上也饰有这种图案（图五，2；图一〇，2）。M180年代在春秋末期，M23在战国早期，M171在战国中期早段。这种图案类似于一种器物底座，目前在其它地方尚未见到公开资料。三星堆K2:149、150青铜大立人赤脚站立的方形祭台，是由勾曲纹和纵目组成^[32]（图一〇，3），K2:194铜神树圆形底座也是由勾曲纹和跪立的人组成^[33]（图一〇，5），如果将纵目形释读为人的抽象表达，铜立人和铜树的底座造型与这种图案都很相似。与M23和M171仅单独饰有底座图案不同，M180:17戈的内部两面还有不同的抽象符号。一面有鸟、几案形和亚腰形符号。鸟为翘尾立



图一〇 底座、树形、王形等图符的概念表达

1. 戈（双元村M180:17） 2. 剑（双元村M23:5） 3. 铜立人底座（三星堆K2:149）
4. 神树形（双元村M82:6钺） 5. 神树（三星堆K2:194） 6. 铜树形饰件（双元村M55:4） 7. 铜树形饰件（黄河M600:7） 8~10. 王、树形铜方印（罗家坝M24:7、金井乡M6:41、同心村M7:22） 11. 月牙形铜印（同心村M25:44）
12. 圆形铜印（罗江周家坝M52）

鸟，与三星堆青铜神树上的鸟形象很相似。几案形符号类似几案的简化表示。这种图形上边为半圆形，下面为两弯撇，亦类似神面獠牙，由于没有比对的材料，其含义只能通过形状大致推测。几案形上方为亚腰形，《集成》共收集158件亚腰形，数量上仅次于手、心形符号，与手形组合频率较高，与心形似乎有替代关系。另一面是手形、心形、王形、云头形等符号。心形是卫聚贤开始定的名称^[34]，陆宗祥又对手、心纹进行了解读^[35]，后来手、心纹名称被广泛使用。手、心形符号几乎和所有象形物像都发生了组合关系。心形符号常带一弯曲的类似枝蔓的细茎，似花蕾和果实。双元村M161②:4号铜剑一面饰手形，一面饰心形，心形旁边就刻画一树形图案（图五，3），该墓年代在战国早期。双元村M82:6铜钺器身刻画一草垛形图案（图八，11；图一〇，4），可能也是神树的一种表现方式。双元村M19:2剑（图八，3）、M28:8矛（图八，2）、M29:1剑（图

八，7）等中心形符号中间都刻画有叶脉纹或树纹。所以心形符号可能有果实、花蕾、树等概念表达。手形一般手臂弯曲，手掌90°向上，五指具备，大拇指外撇。但这件手形除过一个外撇的大拇指外，并无其余四指^[36]。年代较早的黄河工地M535:1铜矛^[37]、双元村M154:52铜牌饰^[38]（图五，8）、三洞桥2号铜矛^[39]等手掌形也没有清晰的手指。没有手指，不一定就是手掌，从形状来看，似伸出枝丫的树干，所以这件铜戈上手、心形组合可能表达有神树孕育果实的概念。稍晚出现的手形均有完整的手指，应该就是手掌的表达。王仁湘认为手、心形是虎的替形，一些虎头在手形下方，表示人手如虎的含义^[40]。前面提到罗家坝M33铜戈虎头上出现弯曲的双臂似乎抓着虎头（图九，5），是很逼真

真形象的手臂，而城关M38:17矛的虎首（图九，6）、双元村M88:33矛的（图九，10）顾首虎纹上方均是常见的手形符号，这些应该都是神人驭虎概念的表达。所以，巴蜀图符中的手形应该具有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可能具有多种功能，与不同的图符组合可能有不同的概念表达。

双元村M15、M55（图一〇，6）及国际花园M850和M940^[41]、黄河M600^[42]（图一〇，7）等春秋墓葬均出土了小型分枝分叉的铜饰件，可能是青铜神树在墓葬中的小型化呈现。战国中晚期印章上出现类似的树枝状图形，可能也具有神树的含义。王形也多出现在印章上，中间一横常不在中间，一般不与树形同时出现，但与王形、树形组合出现的多有并蒂形、星角形、鸟形等相同的符号，所以王形可能是神树形象的另一种表现方式。荣经同心村M7:22^[43]（图一〇，10）、犍为金井乡M6:41^[44]（图一〇，9）与罗家坝M24:7^[45]（图一〇，8）等方

印文图案中间都是并蒂形，前面两个印文内容一致，并蒂形两边是王形，上方为纵目形，罗家坝M24:7并蒂纹两边是树形，上方是圆形星角形，三枚印文图案布局很接近，可能具有相近的概念表述。《集成》收录的荣经同心村M18:15、M18:18方印、M18:17圆印，1986年同心村出土收录在《巴蜀铜印》上的2枚圆印，以及《珍秦斋藏印（战国篇）》160、166号圆印等印文都是两王形、中间并蒂形这种布局，有些笔画不规范的王形和树形极为相似。并蒂形上方一般除过纵目形，还有半星月形、云头形等。德阳罗江周家坝墓地出土的一枚印章^[46]，王形旁边有一树叶、果实（图一〇，12），荣经同心村M25:24印章有王形、心形、树叶（图一〇，11），两枚印章的树叶脉纹清晰^[47]，是明显的树叶图案，其和王形组合，指向性就很明显。所以双元村M180:17铜戈上的底座、手心形、王形及云头纹等，极有可能是神树不同要素或不同种类的图形化、符号化呈现。《分析》一文中的A类印章多有王形，B类印章多有树形，同时指出很多符号重复出现，同一墓地不同墓葬印文很少完全一样，不同地区不同墓葬却偶见印文接近的，这说明巴蜀印章非私印，寓意祥瑞，具有护佑死者的作用^[48]。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王形与树形可能具有同样的含义，概念相同而呈现不同的表现方式可能与不同人群的审美情趣、习惯等有关。明白了王形、树形符号的含义，与二者经常组合出现的并蒂形可能也具有果实、花蕾的含义。王仁湘释读并蒂形为两个心形的组合^[49]，三星堆也出现过双蒂、三蒂形果实饰件^[50]。并蒂形上方的星角形、纵目形可能表示太阳、眼睛的含义。树木长出新叶，孕育果实，寓意新生命的开始，生命轮回，往复循环，其在墓葬中的用意不言而喻。《分析》一文中C类的印章多有壘、钟形符号，壘在古蜀文化中的重要意义。钟形应该是受楚文化等中原文化影响，巴蜀图符在一定社会情境下出现的新内容。拥有壘、钟形印章的墓主一般具有特殊身份^[51]和较高的

社会地位^[52]。这也说明不同社会阶层、人群对早期信仰的不同选择与创新。

（三）补刻现象分析

巴蜀图符中有些符号并不是与载体同时铸造，而是后来补刻的。这些补刻符号毫无章法，彼此之间没有规律可循，完全不同于其它图符的表现方式^[53]。荣经同心村M1^[54]和蒲江飞虎村M32^[55]各出了1件铜矛，两矛骹部都饰有虎纹，形制不一，前者年代在战国晚期，后者年代在战国晚期至秦。相同的是骹部都刻划“成都”二字，“成都”二字明显都是补刻。虽然是汉字，但在巴蜀符号仍旧大量流行的情境下，可看做是广义上的补刻符号。施劲松认为补刻于容器、陶器上的符号是为了强化身份认同^[56]。江章华认为工具上的符号包括后铸的可能代表所有者或生产者的徽记^[57]，徽记其实也是一种身份标识。但这种工具上补刻符号出现较少，并无章法，似乎难以作为徽记。双元村甲类A、B、C型铜斤釜部一面为曲尺形图案，一面或也为曲尺图案，或为一竖线纹^[62]，或为一“八”形图案，这种制作规范，普遍流行的图形不影响器具使用，可能更易作为徽记。补刻符号在早期出现较少，战国中晚期以后出现较多。早期的补刻符号可能有强化身份认同的含义，但在战国中晚期，在新的族群环境中，补刻符号可能更多强调一种认同变化。

综上所述，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大量造型奇特而精致的祭祀品，反映出古蜀人博大而繁缛的信仰体系，这种信仰体系在东周时期被不断变迁的族群可能主要通过口口相传等方式以图形、符号呈现了出来。这些图形和符号并非同时出现，而是处在一个不断丰富和变化的过程中。对巴蜀图符的解读应该放在动态的社会情境中去考察，一种图符可能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概念表达，相同的概念表述不同时期、不同社会群体可能有不同的呈现方式。这种变化只有在大跨度的时代背景下才能反映出来，从这个角度来说，双元村东周墓地的发掘，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 [1]a. 徐中舒. 巴蜀文化续论[J]. 四川大学学报, 1960(1). b. 李学勤. 新都出土的蜀国青铜器[J]. 文物, 1982(1).
- [2]李复华, 王家祐. 关于巴蜀图语的几点看法[J]. 贵族民族研究, 1984(2).
- [3]孙华. 巴蜀符号初论[J]. 四川文物, 1984(1).
- [4]a. 王仁湘. 蜀徽识研究[C]// 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2: 213-235. b. 施劲松. 考古背景中的巴蜀符号[J]. 四川文物, 2020(3).
- [5]严志斌, 洪梅编. 巴蜀符号集成[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9. 以下简称《集成》, 从本书引用的材料, 不再单独注释。
- [6]江章华. 巴蜀符号的变迁及性质分析[J]. 四川文物, 2020(1).
- [7]同[3].
- [8]刘豫川. 巴蜀符号印章的初步研究[J]. 文物, 1987(10).
- [9]代丽鹃. 四川盆地青铜兵器研究[D].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 2011: 183.
- [10]双元村已公开资料: a.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等. 四川成都双元村东周墓地一五四号墓发掘[J]. 考古学报, 2020(3). b.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四川成都双元村春秋墓M180、M185发掘简报[J]. 考古与文物, 2023(1). c.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四川成都双元村东周墓地船棺墓发掘报告[J]. 考古学报, 2023(2). 未公开资料现存于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以下所引, 不单独注释。
- [11]王天佑, 陈云洪. 双元村东周墓地分期与年代研究[J]. 待刊.
- [12]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三星堆祭祀坑[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9.
- [13]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等. 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文物精粹[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8.
- [14]常璩撰, 刘琳. 华阳国志校注[M]. 四川: 巴蜀书社, 1984: 185.
- [15]王天佑. 东周时期古蜀社会变革之考古学观察[J]. 中华文化论坛, 2021(5).
- [16]俞伟超. 考古学中的汉文化问题[C]// 古史的考古学探索.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2: 181.
- [17]王明珂. 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21-33.
- [18]同[4]b.
- [19]同[4]a.
- [20]同[10]c.
- [21]原出自卫聚贤. 巴蜀文化[J]. 说文月刊(三卷), 1942(7). 转引自[4]a: 213-235.
- [22]茂县羌族博物馆, 等. 四川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墓及陪葬坑清理简报[J]. 文物, 1994(3).
- [23]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等. 宣汉罗家坝[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5: 148-156.
- [24]同[23]: 204.
- [25]同[10].
- [26]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等. 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6: 158. 图一六二, 3.
- [27]严志斌, 洪梅. 战国时期巴蜀文化水草纹符号试析[J].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2017(7).
- [28]李复华. 四川郫县红光公社出土战国铜器[J]. 文物, 1976(10).
- [29]刘瑛. 巴蜀兵器及其纹饰符号[C]// 文物资料丛刊(第7辑).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3: 13-33.
- [30]严志斌, 洪梅. 巴蜀印章钟形符号考察[J]. 四川文物, 2015(5).
- [31]同[10]b.
- [32]同[12]: 162.
- [33]同[12]: 220.
- [34]同[21].
- [35]陆宗祥. 巴蜀青铜器“手心纹”试解[J]. 贵州民族研究, 1983(1).
- [36]由于巴蜀青铜器锈蚀严重, 一般保存较差, 大部分没有拓片, 没有手指的手纹不排除晚期存在的可能。双元村墓地目前明确发现两例, 年代较早。与之组合的心形中间有些为叶脉纹, 有些是半括弧形, 可能有不同的含义表达, 应当仔细甄别。
- [37]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成都市金沙遗址“黄河”地点墓葬发掘简报[C]// 成都考古发现(2012).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4: 213.
- [38]同[10]a.
- [39]成都市文物管理处. 成都三洞桥青羊小区战国墓[J]. 文物, 1989(5).
- [40]同[4]a.
- [41]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金沙遗址“国际花园”地点发掘简报[C]// 成都考古发现(2004).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6: 118-173.
- [42]同[37]: 189.
- [43]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等. 荣经县同心村巴蜀船棺葬发掘报告[C]// 四川考古报告集.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8: 263.
- [44]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四川犍为金井乡巴蜀土坑墓清理简报[J]. 文物, 1990(5).
- [45]同[23]: 100.
- [46]刘章泽, 等. 四川德阳罗江周家坝战国船棺墓地[C]// 国家文物局: 中国重要考古发现2012.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3: 69.
- [47]同[43]: 264.
- [48]同[6].
- [49]同[4].
- [50]同[12]: 229.
- [51]同[6].
- [52]a. 同[30]. b. 严志斌, 洪梅. 战国时期巴蜀文化罍形符号研究[J].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2015(11).
- [53]同[6].
- [54]同[43]: 247-248.
- [55]资料现存于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 [56]同[4]b.
- [57]同[6].
- [58]同[11].

(责任编辑 牛海茹)